

■ 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文库 ■

漳州民间信仰 与闽南社会（下）

林国平 钟建华◎主编

ZHANGZHOU MINJIAN XINYANG
YU MINNAN SHEHU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闽南文化研究院学术文库 ■

漳州民间信仰 与闽南社会（下）

林国平 钟建华◎主编

ZHANGZHOU MINJIANXINYANG
YUMINNANSHEHUI

作者：

林国平 钟建华 黄耀明
罗臻辉 张晚松 段凌平
张宏明 马海燕 范正义
郑镛 陈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闽南民间信仰与漳州社会变迁（项目编号：SS1225）

目 录

(下 册)

第四篇 漳州福佬、客家民间信仰

第一章 福佬、客家源流及其在漳州的地理分布	(369)
第一节 福佬、客家源流	(369)
第二节 漳州福佬、客家混居地的地理分布	(372)
第二章 平和县九峰镇民间信仰调查	(383)
第一节 九峰镇历史文化沿革	(383)
第二节 九峰镇民间宫庙与信仰活动	(389)
第三章 漳州福佬、客家谢安信仰	(413)
第一节 漳州谢安信仰源流与分布	(413)
第二节 漳州谢安庙与谢安信仰调查	(426)
第三节 漳州福佬、客家谢安信仰比较	(444)

第五篇 漳州畬族民间信仰

第一章 漳州畬族的分布与漳浦畬族乡	(455)
第一节 漳州畬族的分布	(455)
第二节 漳浦赤岭与湖西畬族乡概况	(463)

第二章 漳浦畬族民间庙神	(481)
第一节 赤岭与湖西民间神明庙宇	(481)
第二节 漳浦畬族的民间信仰的特点与性质	(499)
第三章 漳浦赤岭雨雾顶三界公庙的个案研究	(505)
第一节 雨雾顶三界公庙	(505)
第二节 雨雾顶三界公庙主要祭典	(507)
第三节 祭典组织的基本规则	(515)
第四节 家族竞争与历史记忆	(519)

第六篇 漳州民间信仰的海外联系

第一章 保生大帝信仰的海外联系	(531)
第一节 白礁村的海外联系	(531)
第二节 南靖县麟埭社的海外联系	(555)
第三节 平和心田的海外联系与地方社会变迁	(582)
第二章 妈祖信仰的海外联系	(606)
第一节 角美镇锦宅五恩宫的海外联系	(606)
第二节 乌石天后宫的海外联系与地方社会变迁	(623)
第三章 开漳圣王信仰的海外联系	(649)
第一节 白水石龙宫的海外联系	(649)
第二节 官园威惠庙的海外联系	(667)

第七篇 漳州民间信仰宫庙管理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及其对民间信仰的管理	(685)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	(685)
第二节 历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的基本对策	(687)

第二章 福建省政府的民间信仰庙宇管理	(694)
第一节 福建省政府关于民间信仰管理的探索	(694)
第二节 福建省的民间信仰管理模式	(697)
第三章 漳州民间信仰宫庙管理	(699)
第一节 漳州民间信仰宫庙管理概况	(699)
第二节 平和县三平寺管理沿革	(701)
第三节 平和县山格慈惠宫管理沿革	(712)
第四节 龙海市凤山岳庙和山后红滚庙管理概况	(720)
附录	(728)
后记	(737)

第 四 篇

漳州福佬、客家民间信仰

第一章

福佬、客家源流及其在漳州的地理分布

第一节 福佬、客家源流

一 “福佬”名称的由来与民系的形成

福佬、客家是汉族的两个族群或民系，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和台湾省及东南亚一些国家。

关于“福佬”名称的由来，有许多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福佬”是“福建佬”的简称，是客家人对闽南人的蔑称，久而久之，闽南人不知“福佬”之贬义，自称“福佬人”；另一种说法认为“福佬”是“学佬”演变而来的，“学佬”的客家话意思是教书“先生”，客家人比较穷，多数没有文化，聘请闽南人（或潮汕人）当老师，称之“学佬”，久而久之，便将所有的闽南人、潮汕人称之“学佬”；还有一种说法是福佬先民为了纪念先民从中原河洛迁徙而来，自称“河洛人”，由于闽南话中的“福佬”和“河洛”发音相近，久而久之，讹称为“福佬”。

上述几种说法虽然言之凿凿，且流传甚广，但都有明显的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谢重光教授曾一一予以分析，并认为“福佬”一词毋庸置疑是“被骂出来的”，“是贬义，是他称”。他认为，畚族史诗《高皇歌》所称的“阜老”，最初所指的就是闽南人和潮汕人。至于“福佬”一词的真正由来，则是客家人“在与闽南人、潮汕人矛盾冲突中，抓住闽南人、潮汕人是南人，有很大比例‘獠’的成分，秉承北人轻贱南人之习，骂对方为‘貉子’，为‘獠’，进而把‘貉子’和‘獠’的骂名叠加在一起，骂为‘貉獠’，贬义更强烈，蔑视的程度更深”。“总之，‘福佬’一词的

本字是‘貉獠’，最初是客家人、畲民对于潮汕人和闽南人带有贬义的称呼，用久了，本义逐渐为人淡忘，闽南人和潮汕人也接受了这一称呼，不过排斥了‘貉’、‘獠’这种不雅的字义，代之以‘福’、‘河’、‘佬’、‘洛’等文雅之字，而生出种种新解。”^①

福佬民系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汉魏六朝北方汉族大批迁徙入闽，拉开了福佬民系形成的序幕。六朝至隋唐大批汉人移居晋江流域，隋唐五代又有大批汉人移居九龙江流域，他们与越族、蛮人等土著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方言和民俗。五代时期，留从郊、陈洪进相继主政泉漳，泉州和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大大加强，逐渐形成以闽南方言为载体，以闽越文化为底蕴，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以海洋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福佬民系。宋代之后，福佬民系继续向广东的潮汕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向台湾省、海南岛以及东南亚发展，成为拥有上亿人口的有较大影响的民系。^②

二 “客家”名称的由来与民系的形成

关于“客家”名称的由来，也有许多不同说法。罗香林认为“客家”名称起源于五代宋初，是中原汉族的一支，古司州、豫州流入（山西、河南）南迁者，是先前南迁的汉人对后来南迁汉人的称呼。^③另一种说法认为，“客家”名称源于客家方言。刘镇发认为：“‘客家，是明末清初客家方言群大迁徙的产物，先是迁居异地的客家方言群被当地土著称为‘客’，久而连不曾迁移的‘原乡’居民，也因为族群的文化认同，而全部被称为‘客家人’。”^④刘丽川认为：“‘客家’称谓出现的原因，即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发的垦民潮；最先出现的地域是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区，而且主要是广、肇二府；是当地操粤语的原住民对来自赣、闽、潮、嘉、惠等地客属移民的总体称呼。因此，‘客家’称谓是出现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颁布‘复界令’

① 谢重光：《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194页。

② 关于福佬民系的形成，参见谢重光《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7—79页。

的康熙二十三年之后。”^①最近,谢重光对“客家”名称由来提出新的说法,认为:“客家族群移民到粤中、粤西,被广府人称为‘客家’,移民到闽南、潮汕平原及台湾,被福佬人称为‘客’、‘客子’、‘客仔’、‘客民’,都是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的产物,两者之间谁先谁后,虽无文字记载可资确证,从族群接触先后的历史事实推测,应是福佬人先有此称,广府人继有此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不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客家与畬族都居住在赣闽粤边的山区,以其居处之邻接和生产、生活习惯之相似,而被福佬人和广府人误认为同一族群,由畬族的‘畬客’、‘山客’之称而将客家族群称为‘客仔’、‘客民’、‘客家’。至于‘客家’或‘客民’、‘客仔’称谓最早出现的时间,因为文献记载的缺略,已难于确断,但从《香山县志》的记载可知,不会晚于明中叶嘉靖年间。谓其乃清初迁海复界之后始起之说,是难以成立的。”^②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罗香林的五代至宋初说,他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明确指出:“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③邓迅之在《客家源流研究》一书中,赞同了这一观点;^④陈运栋的宋末说,他在《客家人》一书中提出:“客家民系于宋末成为一种新兴的民系;”^⑤吴福文的唐末至北宋说,他在《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一文中提出:“客家民系形成于唐末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⑥谢重光的南宋末年说,他在《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提出:“在南宋中后期的汀州,另有一个新的族群也正在孕育中。”^⑦刘佐泉是清代说,他在《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认为,客家民系是否形成,取决于其集团的自觉性意识是否形成,客家民系最后形成的标志是清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年)客家学者徐旭曾先生所作的《丰

① 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6页。

② 谢重光:《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③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 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天明出版社1982年版。

⑤ 陈运栋:《客家人》,联亚出版社1981年版。

⑥ 吴福文:《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

⑦ 谢重光:《客家、福佬源流与族群关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湖杂记》，它可以说是一篇“客家人宣言”。^① 笔者比较认同谢重光的客家民系孕育于南宋中后期的观点，我们认为，判断民系是否形成，最重要标志是形成独特的方言和民俗。客家人迟于福佬人迁入福建，主要聚居在闽、粤、赣山区，他们与南方畲侗族等少数民族融合，大约南宋时，就形成“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② 而语言和风俗都不同于福佬人，独具特色。元明清时期，客家人逐渐形成汀州、梅州、惠州、赣州四大中心，并大量外迁到华南各省乃至世界各地，至今在海内外拥有 6000 万客家子民。

第二节 漳州福佬、客家混居地的地理分布

福佬与客家是两个文化特征鲜明的民系，福佬民系形成于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客家民系孕育于汀江流域和闽粤赣交界区域，由于地理上的阻隔，福佬、客家民系形成早期，两者很少发生交集。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膨胀，福佬人和客家人开始大规模向漳、汀、潮州交界的山区进军，两个民系形成交集，甚至相互渗透，即在福佬人聚居地中有客家人，在客家人聚居地中也有福佬人。

客家人和福佬人均分布在福建的南部。客家人分布于汀州的西南端，福佬人在泉州和漳州的东南部。明中叶以前，客家人与福佬人的界限是南北走向的博平岭，客家人在西，福佬人在东。随着开发程度的加深，客家人和福佬人的核心聚居区都出现了人口大量增长、人地矛盾加剧的现象。于是，客家人和福佬人两个民系先后向博平岭东西两麓开发。

客家人东进，福佬人西进，两个民系因而有了紧密的接触，其互相邻接的界面就是博平岭。从当前行政区划来看：博平岭以西基本上是龙岩市的辖区，主要居民虽也是客家人，但龙岩市辖属的新罗区和漳平市，却属闽南方言区，大部分居民属福佬人；博平岭以东则主要是漳州市辖区，大部分居民虽也是福佬人，但其中南靖县、平和县、云霄县、诏安县的西部乡镇，如南靖县的梅林、书洋，平和县的长乐、九峰、崎岭乡、大溪和国强乡，云霄县的马铺、和平乡、常山华侨农场和下河，诏安县的太平、官

① 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河南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临汀志》“教授题名”，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3 页。

陂、霞葛、秀篆等乡镇,居民却以客家人为主或有相当比例的客家人,在文化上与其西邻的客家县份属于同一地理单元。^①两个民系的接触必然会带来相互之间文化上的互相采借、涵化和融合,但民系间也会因为物质和文化资源的争夺而发生众多矛盾和争斗。最终,弱勢的客家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福佬人的影响,乃至产生一种特殊的群体——“福佬客”。^②

一 南靖县福佬、客家混居的地理分布

为了加强控制,元代设立了南靖县,其县“本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元至治中,以其地险远,难以控驭,遂析置南胜县,在九围矾山之东。至元三年(1337年),畚寇李胜等作乱……遂徙治小溪琯山之阳。至正十六年(1356年),县尹韩景晦以地僻多瘴,又徙于双溪之北,改为南靖县”。^③因地处福建南陲,且屡寇不靖,故把南胜县改名为南靖县,意为“南方之静”,以兆佳祥。为了加强对“流寇”地区的控制,明朝廷于成化初从龙岩县析置漳平县,正德中又设南靖,这也是福佬人向博平岭东麓进军的反映。

后来,客家人也对博平岭山区开发,成化十四年在博平岭西麓南端设立永定县。^④这样,客家人在福建的开发进程已越过玳瑁山挺进到博平岭,尤其是上杭、永定等县客家人推进至漳州府属的南靖、平和、云霄、诏安等县的西鄙、北鄙开基立业,使这些县份的西部、西北部山区成为客家人聚居区。^⑤

如今南靖县的客家人聚居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山区的梅林和书洋两个乡镇。据南靖县客联会张会长说,南靖客家人除了书洋、梅林两乡镇的土著客家人外,还有自四面八方迁入的客家人,其中来自永定的最多。现住

① 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② 顾名思义,“福佬客”是指被福佬人同化的客家人换言之,“福佬客”本属客家人,但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几乎完全摒弃了客家生活习惯,向福佬族群看齐,其最典型的标志是客家话流失,改操闽南话作为特殊群体的福佬客身份尴尬。

③ 乾隆《南靖县志》卷一“建置”,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本1992年。转引自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④ 永定县建县情况,见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二《方域志》“汀州府·永定县”条,第538页。

⑤ 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县城的就有 1000 多户。他估计南靖客家人总数有 10 万人。^① 这两个乡镇的辖境，在民国年间分属于梅江乡和书教乡。据民国《南靖县志》，“梅江、书教一隅近邻永定，其语纯操客话，则其风俗至少有一部分与闽西同化”，^② 可见当时梅江、书教两乡应是纯操客话的纯客乡镇。

南靖县书教、梅江两乡的客家人，大多数来自临近的永定县，少数来自其他客家县份如宁化县、上杭县、广东大埔县等，还有就是已经入居这两乡的客家人在本区范围内的再迁移。客家人迁入南靖县开始于宋末，元末也有少数的客家人迁入，但是比例不高，大部分是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叶。虽然有些姓氏迁自何时不明，但注明入居已二十几代或十八九代，由此推知迁入时间在明中后期。清代迁入的也有一定比例。由于上杭、宁化、大埔等县都是客家基本住区的纯客家县份，故此类移民可以看作客家基本住区的客家人向闽南福佬人住区的拓展和渗透，其时间始于宋末，至明中叶达到高潮，移民过程则持续到清代。^③

在客家人迁入南靖县西部山区的同时，大量的福佬人也迁入了南靖县其他地区。在《南靖县志·氏族志》中，这样的例证很多，如靖城镇玳坑社王氏，明初由漳州玳坑迁入，程塔乡冬楼、陈婆楼王氏，明永乐三年（1405 年）由漳浦县横口迁入，金山乡荆溪、金塘保吴氏，明初由龙溪下陂社迁入，金山乡碧溪吴氏，元末由漳浦、南胜、圆岭三地迁而至碧溪，金山乡荆美保山尾社李氏，明初由龙溪西渡头迁入，武山乡黄田保东洋余氏，清代由龙溪县天宝山兜社迁入，金山乡荆美保山尾社何氏，明初由漳州黄山脚迁入，^④ 不一而足。漳州、龙溪、漳浦等地福佬人的大批迁居南靖县，反映了福佬人向西拓展的态势。

南靖福佬人与客家人这两个民系迁徙是由于经济和社会进步、人口膨胀，耕地不足，只得向外寻找发展，于是产生了大量新移民。这些移民在荒无人居而适宜垦殖的地方，筚路蓝缕，建立新的家园，这样建立的新家

① 谢重光：《走出隐形的阴影：漳州客家人生存状况调查》，《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第 5 页。

② 郑丰稔总编纂：《南靖县志》（民国三十七年稿本）卷四《地理下》“风土·风俗”，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本 1994 年版，第 109 页。

③ 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3 页。

④ 《南靖县志》（民国三十七年稿本）卷六，《氏族志》，第 142—150 页。转引自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4 页。

园往往就是插入福佬人占统治地位县份中的客家新居民点。

然而,福佬人、客家人两个民系的过渡带得到开发的另一途径便是官府讨平“寇盗”并择址设县。这两个民系生存的地方多半是“土瘠民劳”、^①崇山峻岭、地势险要的地区,成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贼寇”的巢穴,动乱的中心。为了平息盗贼,在动乱地带设立县治,通过里甲户籍、科举制度和礼仪系统等,确促使两大民系逐渐进入到王朝体系之中,从而达到长治久安。如平和县、诏安县的两大民系便是在政府设立县治中逐渐融合。

二 平和县福佬、客家混居的地理分布

平和县处于闽粤交界处的闽西南山区,原来是土著族群聚居之地,“蛮獠难化”“寇盗滋多”,经常发生社会动乱。康熙《平和县志》宣称:“邑居边徼,寇盗滋多。地连瓯粤,蛮獠难化。况崇岩巨浸,林木啸聚。山隅海曲,伏莽多虞乎。至于乘时借势,妄指义旗,又有倚衣冠为盗藪,以荼毒乡里者,无怪乎叛乱相寻,不一而足也”。^②

正德年间平定朱秉瑛之乱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九峰一带展开的。早在正德元年(1506年),漳浦就受广东饶平朱秉瑛、黄白眉等“流贼”的骚扰,^③“始至不满九十人”。^④到正德二年(1507年),处于闽粤交界的“流寇”更是流窜于南靖、云霄、泉州等地,“贼首朱秉瑛等,带领徒党在象湖山创营,劫杀人财,掳去粮户曾钦玺等男女未放”。^⑤象湖山,位于漳州、汀州、潮州三府交界之处,为南靖县最为边远之地。朱秉瑛在现在的平和九峰一带流窜,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正德二年(1507年),为了加强对于这个地区的控制与联系,官府在南靖县西路设立九个铺,但效果并不明显。正德六年(1511年),饶平

① 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诏安县·輿地志》,第602页。

② 康熙《平和县志》卷十二《杂览志》,第268页。

③ 正德《漳州府志》卷之二十八《兵纪·兵政志》,五a。

④ 同治《南靖县志》不分卷《灾祥》,载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3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页。

⑤ 正德《漳州府志》卷之十八《礼纪艺文志》。

“清远盗黄白眉等作乱”，^①到了正德八年（1513年），“芦溪、箭管贼反”，^②到正德十一年（1516年），“漳州地方，今年二、三月以来，卢溪等处流贼詹师富等，聚众数千，抢掠人财”。福建监察御史胡文静等奏称：“各贼巢穴，根连二省，众已几万，若非调兵扑灭，恐其为患转大，又恐广东官兵不相策应。”^③于是，南赣巡抚王阳明调动福建、广东两省军队，派遣福建按察司僉使胡珪等，统领军兵五千余人进至长富村等处平息动乱。

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动乱平定之后，南靖县生员张浩然等人请求在动乱地带设立县治，有利于教化，以期长治久安。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二月初九，胡珪、施祥及徐凤岐亲到河头，告祀社土，伐木兴工。到第二年五月，外筑城垛俱已完备，惟表城因风雨阻滞，要到九月方能完工。^④这样，平和县治建于九峰，平和的民众被编入里甲赋役系统，至此官府开始对平和一带实行了有效的统治。

平和原为南靖县的清宁里和新安里，平和的一些民众在明前期已经进入了南靖的里甲户籍系统。如平和九峰的朱氏在宣德七年（1432年）取得户籍、曾姓也应该在建县之前就有了户籍。正德年间的动乱，则同当地一些脱离里甲户籍系统的“流民”密切相关，他们对地方社会构成威胁。那些有户籍的家族也无能力控制这一地区，地方出现里甲系统混乱的局面。在平息动乱、设立新县之后，大量“新民”重新纳入里甲户籍系统。^⑤

平和建县过程中，地方豪强积极配合。建县后，地方豪强为培养士绅阶层，平和地区的应试人数大幅度增加。直到万历年间，平和开始有了自己的举人。于是，这些地方豪强逐渐演变为科举世家。到了清代，平和县不仅培养了大量举人，而且还出现了高层士绅，如进士等。

儒家礼仪也随着科举事业的发展而逐渐渗透到平和地区社会。宗族开始成为平和县福佬、客家两大民系的主要社会组织。各大族、地方豪强纷

① 嘉靖《大埔县志》卷九《杂志寇贼》。

② 康熙《平和县志》卷之十二《杂览》。

③ 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十《为急报贼情事》，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廖希颜刻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史部47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④ 王阳明：《再议平和县治疏》，《王阳明全集》卷九《别录三·奏疏三》，第381页。

⑤ 朱忠飞：《明清时期闽西的“福佬客”：平和九峰与诏安二都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2年。

纷开始致力于宗族建设，如平和九峰的曾氏，在建县不久就开始修谱、建祠堂以及寻找祖坟。后来，这些世家大族在继续追求科举功名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商业活动，在经商致富之后致力于地方公共事务，在城乡各地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意识联盟，争夺地方社会的主导权。^①

如今，平和县的长乐乡，九峰镇，崎岭乡，国强乡和大溪镇是客家人主要分布区（图4-1）。平和地带的福佬人、客家人这两大民系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和市场体系，建立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这就使地方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士绅化和商业化的特征。



图4-1 平和县客家分布图^②

三 诏安县福佬、客家混居的地理分布

诏安原为百越之地，置县之前地称南诏，相传“唐时有南诏人过此，

^① 朱忠飞：《明清时期闽西的“福佬客”：平和九峰与诏安二都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2年。

^② <http://www.hxkjw.com/read.php?tid=287>, 2015-03-06.

言此风景好，似南诏，改以南诏为名”。^① 唐垂拱二年（686年）属漳州怀恩县，开元二十九年（742年）并入漳浦。明弘治间，“广寇为患”，调漳州卫后所官军置南诏守御千户所。正德十四年（1519年），“添设捕盗通判，兼平和、饶平提督之”，不久便废。^② 嘉靖八年（1529年），乡民许仲远等请求设县，当时正在京城任官的南诏人叶亶上《奏设县治疏》，其理由有三：其一，南诏处于闽广交界之处，远离漳浦县治，山林险恶、道路崎岖，百姓服徭役困难，所费巨大，造成百姓贫困。加之民风顽梗，使得“租粮逋负”，抗官之事时常发现，从而造成盗贼滋生；其二，弘治、正德年间设置的南诏千户所和捕盗通判，都不能解决地方问题，不能使地方长治久安；其三，南诏县的情况，无法上达朝廷。^③ 因此，叶亶请求朝廷仿效大埔、平和、峡水、三山、惠来等县的情况设县。

弘治十七年（1504年）、正德十四年（1519年）、嘉靖初，南诏地方人士多次申请设县，其背后显然有许仲远、叶亶等南诏的世家大族极力推动。从朝廷来说是为了加强控驭，从百姓的角度来说，则是为了拓殖开发。嘉靖九年（1530年），割漳浦二、三、四、五都，设立诏安县。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漳浦六都之铜山，并入诏安。嘉庆三年（1798年），割四都余甘岭以东26个村归云霄厅。民国五年（1916年），铜山和五都从诏安析出，置东山县。^④ 因此，现在的诏安县就只包括二、三、四三个都。新县设立后，加速了县境内的户口繁衍、土地垦辟。

万历《漳州府志》称诏安“土瘠民劳”。^⑤ 设立新县之初，诏安两大民系的当务之急，就是设法进入里甲户籍系统。当地广泛存在的复姓宗族，集中反映了闽西南福佬人、客家人进入里甲系统的复杂过程和灵活多元策略。诏安居民长期拥有乡族武装，也可以说是当地两大民系的重要生存策略。明末清初，诏安的各大家族拥兵自重，与不同的政治势力结盟，追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远离官府，文教不兴，诏安县的各主要家族

① 秦炯纂修：《诏安县志》卷三《方輿志》，康熙年间修，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② 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诏安县輿地志》。

③ 朱忠飞：《明清时期闽西的“福佬客”：平和九峰与诏安二都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2年。

④ 陈荫祖修、吴名世纂：《诏安县志》卷二《地理志》，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诏安青年印务公司铅印本。诏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诏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⑤ 万历《漳州府志》卷二十九《诏安县·輿地志》。